

S

007157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一本

紀念 李濟、屈萬里兩先生論文集

第二分

目錄



殷周關係的再檢討.....	張光直
由新出簡牘所見秦漢社會.....	許倬雲
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移轉.....	毛漢光
我國歷代輪種制度之研究.....	陳良佐
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	杜維運
洛陽伽藍記札記兼評周祖謨校釋.....	王伊同
再論蔑曆.....	白川靜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Atayal Dialects.....	Paul Jen-Kuei LI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

中華民國 臺北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一本

紀念 李濟、屈萬里兩先生論文集

第二分

定價新臺幣壹佰元正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藏路251巷8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98號 三民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

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

高去尋 (主席)	陳 槃 (常務)	芮逸夫 (常務)
李孝定 (常務)	黃彰健	張以仁
丁邦新	龍宇純	石璋如
管東貴	張秉權	李壬癸 (秘書)
宋光宇 (助理)	何大安 (助理)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S9004380

第五十一本

紀念 李濟、屈萬里兩先生論文集

第二分

目錄



殷周關係的再檢討·····	張光直···	197-216
由新出簡牘所見秦漢社會·····	許倬雲···	217-232
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移轉·····	毛漢光···	233-280
我國歷代輪種制度之研究·····	陳良佐···	281-313
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	杜維運···	315-323
洛陽伽藍記札記兼評周祖謨校釋·····	王伊同···	325-335
再論蔑曆·····	白川靜···	337-347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Ataya Dialects·····	Paul Jen-Kuei LI···	349-405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

中華民國 臺北

殷周關係的再檢討

張 光 直

一、前 言

二、舊史料中所見殷周關係

三、考古遺物中所見殷周關係

四、殷墟卜辭中所見殷周關係

五、岐山甲文中所見殷周關係

六、小 結

一、前 言

最近三年以來陝西中部鳳翔府地區扶風、岐山等縣境周代早期文化遺址的發掘，在中國古史的研究上，是件劃時代的大事。有人說，「岐邑的發掘，在考古工作中的重要性不亞於殷墟，它的學術研究前景，在某種意義上說，可能優於殷墟（1）。」二十世紀初，由甲骨文的發現而導致殷墟的發現與發掘，從而證實了殷商這一個朝代的信史地位，並且把中國古史與史前史基本上銜接了起來（2）。最近周原的調查與發掘導致了周代甲文的發現，在武王伐紂以前周人開國時期的文化與歷史上提供了新的資料；這批資料不但在周人的早期歷史上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中國三代期間城市文明的整個形成過程有非常要緊的啓示。這個啓示的焦點，可以說是在殷周關係的上面的。

在古代文明的萌芽階段，國家與國家對立關係，是國家與文明的產生程序中的一

* 作者附記：李濟之和屈翼鵬兩師都是研究殷周史的，所以選了「殷周關係的再檢討」這個題目來紀念他們。濟之師著作等身，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是開山的一代宗師，可是他透過寶雞柶禁器物羣對西周古代文化的研究，倒還沒有引起後學者的普遍注意。翼鵬師之主張考古與經學並進研究古史，則是大家所熟知的。我相信他們兩位對這篇文章所討論的題目，一定是會有很大的興趣的，可惜我再也得不到他們的教益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

（1）陳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 1979 年第十期，50 頁。

（2）李濟：「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本所集刊，40（1969），913-944 頁；“Importance of the Anyang discoveries in prefacing known Chinese history with a new chapter”，中央研究院院刊，2（1955），91-102 頁。

個重要條件。「國家的產生不可能是孤島式的，而是平行並進的。……夏商周等列國在華北所占居的位置不同，所掌有的資源也不同。三個或更多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彼此在經濟上的連鎖關係造成全華北自然資源與生產品的更進一步的流通，對每個國家之內的財富集中和剩餘財富的產生造成更為有利的條件。同時，依靠國外的威脅來加強對內的團結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統治技術。……夏商周等列國彼此競爭關係，以及各國由此在長期歷史上所造成的國家意識，因此也是使各國內部政治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³⁾」。周原考古的新資料，使我們對於早周文明和社會（即伐紂以前的周代文明與社會）增加了新的瞭解，使殷周關係的研究有了事實上的基礎，其重要性是顯然的。

周原甲文的發現，在這上面的意義更是空前的。殷墟的甲骨文使我們看到了在殷周關係上商人的一面；周原的甲文又使我們看到了在這個關係上的周人的一面。在全世界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上，國家起源問題以及國與國之間關係問題，自然也有第一等的重要性，可是在其他的最早的古代文明中心，像我們所有的這樣兩個鄰國都有文字史料而提供兩方面不同看法的這種情形，如我們所知的，是沒有前例的。所以岐山新出的這批甲文，從全世界古代文明起源問題上看，也是第一等的重要資料。

周原考古和甲文發現還只有兩三年的歷史，所發現的資料也還只有初步的報告⁽⁴⁾。可是我們今天對中國古代史的知識，比起殷墟甲骨文初現的時代，要豐富一些，所以材料雖少，却不妨一邊開始作初步的討論。本文的目的，是就殷周關係問題上，自舊史料、考古、殷墟卜辭、和周原甲文各方面檢討一下新舊問題之所在及前景。

二、舊史料中所見殷周關係

舊史料中所見周開國經過是大家都很熟悉的⁽⁵⁾，但其中也有若干難以解決之間

- (3) 張光直：「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305-306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
- (4) 陳全方：「陝西周原考古的新收穫」，文物與考古（光明日報副刊），第107期，1979年七月。「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10），27-37頁；「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10），38-43頁；徐錫台：「早周文化的特點及其淵源的探索」，文物，1979（10），50-59頁。
- (5) 重要的研究論文有：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本所集刊，七本（1936），137-164頁；顧頡剛：「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文史雜誌，第一卷第三期（1941），8-17頁；許倬雲：「周人的興起及周文化的基礎」，本所集刊，38（1968），435-458頁；屈萬里：「西周史事概述」，本所集刊，42（1971），775-802頁。

題。因最早期史料裏沒有殷周接觸，而武王時代的接觸關係資料則又非常豐富而且集中在伐紂上，所以這裏只檢討太王、王季，和文王三代。

太王自豳遷都到岐下的周原，開始與東面的殷商發生較密切的直接接觸關係，這是史料中所公認的。詩魯頌閟宮說：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關於太王（即太王、古公亶父）居岐之陽事，史記周本紀有較詳的敘述：

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其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類似的描寫，亦見於較晚的帝王世紀（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七及長安志卷二引）。這一段故事的來源，顯然是詩經和孟子。詩大雅緜篇：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此。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揀之陟陟，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履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關於古公亶父遷都到周原的原因，據孟子梁惠王下所說是受了狄人壓迫的緣故：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古公亶父雖然被迫去邠，到了周原以後却大興起來：娶太姜爲后（史記正義引國語注及烈女傳），「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同上引烈女傳）。照今本竹書紀年的說法，太王遷到岐周是在殷王武乙卽位之後。武乙三年之後，「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是正式的承認了周人的地位。這雖與魯頌上所說「實始翦商」的精神不同，都說明了自此殷周正式交往。今本竹書紀年並云武乙二十一年時「周公亶父薨」。他死後傳位於三子季歷，再傳文王、武王，很快的便取殷而代之了。

古公亶父在岐陽定居開國這一段故事，雖然簡單，却包含了好幾個在古史學家之間爭訟不一的問題。首先，古公亶父是否卽是太王？舊史料中自孟子起一致說是，顧頡剛却以爲不然。他認爲古公亶父是周國開創時期的一個王，而太王則已是興盛時期的周王了⁽⁶⁾。實際上，自太王到文王只有三代，其文化則自「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突然飛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泱泱大國，早已引起學者的懷疑。依顧氏的說法，則古公亶父屬於周國的早期歷史，其文化原始便不足爲奇了。（另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將縣篇裏「陶復陶穴」以前的「古公亶父」四字視爲衍文，將「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視作「自土沮漆」這個區域的原始狀況⁽⁷⁾。）可是專從舊文字史料上看，這個問題是無法充分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逼迫太王自豳遷徙到岐下的狄人，是不是便是殷高宗（武丁）所伐的鬼方？徐中舒先生嘗云「鬼方之本據原在山西，晉地之近境。當武丁之世，鬼方不勝殷人之壓迫，轉而西侵，故豳地首當其衝。以此太王不得不南遷於岐，以避其鋒」⁽⁸⁾。這個問題也牽涉到太王到文王、武王時期甚短的現象。上文引今本竹書謂太王遷岐乃在武乙之世。即使今本竹書全不可靠，自武乙上到武丁，要經歷祖庚、祖甲、廩辛、康丁四世，其中祖甲一世，依無逸所說便達三十三年之久。因

（6） 上引顧頡剛「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14頁，註五。

（7） 錢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學報第十期（1931），1986頁。

（8） 上引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140頁。

此徐說在年代學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難⁽⁹⁾。最後一個爭訟的問題，是太王所遷去的周原的位置。過去古史家多以周原在今陝西岐山、扶風縣境⁽¹⁰⁾。惟錢賓四先生置岐於洛水下游之富平一帶，在渭水下游，以符合他的周先世起源於山西汾河流域之說⁽¹¹⁾。從新發現的岐山、扶風縣境的「宮殿基址」和周初甲文看來，傳統的說法恐怕是比較可靠的；這且留到後面再談。

繼太王爲周人領袖的王季，在舊史料裏也有不少事蹟，看來曾在周人勢力之擴張上有過很大的貢獻，在其擴張過程之中也就與商人的關係日趨密切。按王季之繼位本身便有一段衆知的故事；史記周本紀云：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徐中舒先生「疑太伯、仲雍〔即虞仲〕之在吳，即周人經營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開始，因爲大王之世，周爲小國，與殷商國力夙乎不侔。當其初盛之時，決不能與殷商正面衝突。彼必先擇抵抗力最小而又與殷商無甚關係之地經略之，以培養其國力」⁽¹²⁾。這個說法，在原則上是非常合理的；只是「荊蠻」所在的江漢流域却不能說是「與殷商無甚關係之地」。

古本竹書紀年中關於王季紀載頗爲不少：

(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八匹。(太平御覽卷八三引)

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

(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全上)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全上)

(9) 見上引許倬雲「周人的興起及周文化的基礎」，註四三。

(10) 齊思和：「西周地理考」，燕京學報，30 (1946)，79-82頁；陳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 (10)，44-50頁。

(11) 錢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學報，10 (1931)，1985-1992。

(12) 上引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139頁。

七年，周人始伐始呼之戎，克之。（全上）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全上）

文丁殺季歷（晉書束皙傳、史通疑古篇、雜說篇引）

今本竹書紀年略同，僅在文丁時代增加了一條「五年，周作程邑」。以古本所記來說，季歷時代，周人最重要的活動，一是「伐諸戎」（通鑑前編卷五注引帝王世紀），一是受殷王之封爲「牧師」，或爲帝王世紀（毛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引皇甫謐）所說爲「西長」。除此以外王季的妃太任，也是自殷商娶來的。詩大雅大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

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大雅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這位文王之母、王季夫人的任姓女子來自摯國。顧頡剛早曾指出周王的妃婦不止一次娶自殷國境內；不但文王的一個妃子可能是帝乙的妹妹（見下），而且「王季的妻……雖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內的諸侯⁽¹³⁾」。殷墟武丁時代卜辭有婦妊⁽¹⁴⁾，也有子摯（或子執）⁽¹⁵⁾，可見這個摯國的任姓女子與殷商王室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國與國王室公族之間的通婚在周代的後期，屢見不鮮，構成所謂「甥舅之國」⁽¹⁶⁾；甥舅之間的政治地位，似乎以甥爲高，即娶婦國高於嫁女國⁽¹⁷⁾。殷周之間如果有婚姻關係，則其相對的政治地位正與此相反，即嫁女國高於娶婦國。其間變化的原因與細節，一時恐難搞得清楚，但這現象是值得注意的，因爲文王的一個妃子似乎也是自

(13) 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燕京學報，6 (1930)，979 頁。

(14)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1959 年，28 頁。

(15)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77 年，444 頁，

(16) 芮逸夫：「釋甥舅之國」，本所集刊第三十本 (1959)，237-258 頁。

(17) 張光直：「商周神話與美術中所見人與動物關係之演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期 (1963)，125 頁。

殷商娶來的；詩大雅大明：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洙。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俶天之妹。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續女維莘。
 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對此詩較明顯的解釋，是文王自莘國娶了姒姓的妻（又見思齊：「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生了武王。莘國是伊尹所出，與殷商王室的關係也很密切；殷商以王畿內的摯、莘等國異姓的女子（妊、姒）嫁給周王，也許是在婚嫁兩方的相對政治地位上看來比較合適的做法。可是顧頡剛先生根據易卦爻辭中的「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六五）和「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去」（歸妹六五），認為「周易中的帝乙歸妹一件事就是詩經中的文王親迎的一件事」⁽¹⁸⁾。

帝乙爲什麼要歸妹與周文王呢？……自從太王……以來，商日受周的壓迫，不得不用和親之策以爲緩和之計，像漢之與匈奴一般。所以王季的妻，就從殷商嫁來，雖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的諸侯之女。至帝乙歸妹，詩稱「俶天之妹」當是王族之女子。（依左氏哀九年傳的話，這個妹是「帝乙之元子」）。後來續娶莘國之女，也是出于商王畿內的侯國的，……周本是專與姜姓通婚姻的，而在這一段「翦商」的期間，却常娶東方民族的女子了⁽¹⁹⁾。

據此高亨也說，「文王元妃，乃殷帝之子，……文王次妃卽太姒，武王之母也。……

(18) 上引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979頁。

(19) 同上。

帝乙所歸之妹，疑因故大歸，……故文王又娶大妣乃生武王也」⁽²⁰⁾。又說，「帝乙歸妹與文王，其媵娣從，其君之貌不如其娣之貌美」⁽²¹⁾。

這種種說法，都是非常有意思並且有重要性的，我們不妨把它們都記下來以「立此存照」。上面顧頡剛先生所說「商日受周之壓迫」，也就是商周兩國之間開始有嚴重的衝突，恐怕是王季與文王初年周王的一連串的征伐擴張行動所逐漸引起的，亦即書序西伯戡黎所說的「殷始咎周」。兩國通婚其實是其衝突的一個象徵；「文丁殺季歷」的傳說，是其更為直捷的一個表現。但文王時周人勢力之增大，「實開滅殷之基。論語謂：文王之時，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大抵至文王之時，周之勢力已達於陝西全省，甘肅、山西、河南之一部，似可斷言⁽²²⁾」。文王擴張之經過，照比較可靠的史料看來，初服虞、芮（大雅緜），齊思和先生以為今隴縣境，在岐都之西北⁽²³⁾。書經所記西伯戡黎之黎，一說是在驪山之下⁽²⁴⁾。司馬遷在史記裏所列舉的征伐，有犬戎（桀之後，當在南方）、密須（正義引杜預謂在安定陰密縣，在隴東）、耆國（即上述之黎）、邶（正義引括地志置於懷州河內縣，屬今河南沁陽）、和崇侯虎（正義云在豐鎬之間）⁽²⁵⁾。伐崇之役，規模很大，詩大雅皇矣有生動的描寫。這一役是成功的，其後便在崇地一帶作豐邑，文王自岐下徙都於豐，作了向東進一步征服的準備。

周文王這一連串的征伐，自然引起殷商的關心。邶國已深入商王田獵區，是殷商經濟的一個重心；史記只說「伐邶」，當未敗滅，但用兵至此，已是很明顯的將商人的虎鬚了，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的，「周文王伐邶一事是周商勢力對比轉換的標誌，因為邶即沁陽的孟，文王伐此地，可以直驅而至商郊」⁽²⁶⁾。滅黎（耆）之後，「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周本紀）。在這種威脅之下，帝紂何以尚有心情和力量大舉征人方，把兵力集中於東南，則是不可理解的。大概

(20)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香港中華書局，1975年，44-45頁。

(21) 同上，189頁。

(22) 上引齊思和，「西周地理考」，89頁。

(23) 同上 83-84頁。

(24)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66頁。

(25) 國名現地參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增訂本），本所專刊，52（1969）。

(26)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1956年，97頁。

在文王時代，商周兩國關係還在敵友之間。史記殷本紀和周本紀都記帝紂封西伯爲三公之一，但忽囚西伯於羑里，忽釋西伯並賜以矢、斧、鉞，大概二者之間的關係，在文王治周期內，已自大邦與附庸的關係，演進在相與拮抗的程度，殷商對周只好軟硬兼施，虛與委蛇。古本竹書記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覽卷八三引），但乏帝辛時代記述。照今本竹書所列，商周關係在帝辛時代的發展如下：

命九侯、周侯、邳侯。

六年西伯初禱于畢。（據漢書劉向傳注，在豐西三十里）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二十三年囚西伯於羑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邳，遂伐崇，崇人降。

三十五年周大饑。

西伯自程遷於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述，大家都公認是不能作爲歷史討論的唯一的基礎的；事實上連古本竹書的可靠性都有人懷疑⁽²⁷⁾。不過上面所述事件，多半在其他史料中也有出現，

(27) David N. Keightley, "The Bamboo Annals and Shang-Chou Chronolog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 (1978), 423-438.

似乎不是宋以後學者完全憑空偽造的，事件發生的順序也大致合乎我們的理解，只是其確實的年代不盡可靠而已。

三、考古遺物中所見殷周關係

從考古學上看殷商關係可有兩個研究的方面。其一、周因於商，周滅商以後中原文化遺物（以銅器為主）有多少是繼承殷商一緒下來的，有多少是有所損益變化的？其有損益變化之處，是由於年代較晚所致之變化，還是反映着伐商以前周人文化的特質？其二、滅商以前的周文化遺物與同時的殷商文化異同如何？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滅商以前的周文化的發現是較晚近的，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先有，而第二個問題是在近年才逐漸出現的。

首先有系統的討論西周銅器形制花紋與殷商銅器異同的是高本漢氏。照他的說法，殷商與西周早年的銅器都是屬於他所謂「古典式」的，中間實在沒有什麼重大的分別。他一度提出少數幾點形制和花紋上的特徵作為西周的新發明，如彎耳、鈎狀稜、舉尾鳥、和盤，但後來又根據較新的考古發現取消了這個說法而將殷到西周初年這一段的青銅器當作一個連續的整體來看待⁽²⁸⁾。但關於武王伐紂以後西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特徵有何新發明的問題，陸續有其他的研究⁽²⁹⁾。現在看來，新成份雖然不多，却是有的；問題是這些成份是不是代表原先存在的一個「周文化」的個別傳統？

把西周銅器特徵問題自周初變化有無提高到商代周人個別傳統，是李濟之先生在研究寶雞之禁器羣時明顯的提出來的。這一羣銅器一共有十四件，傳是端方（陶齋）在1902年在陝西寶雞鬪雞臺購買的。1924年端方後人將它們賣給了紐約市博物館。照李先生的研究，這十四件器物（解四、尊一、卣二、觚一、爵一、角一、盃一、盥一、斗一、禁一）原來出土於一處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諸器製造的年代頗有先後。其中較晚的可能遲到西周初年，但多數都可能是屬於殷商時代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屬

(28) B. Karlgren,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Bull.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8 (1936), p. 110;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Ibid.*, 9 (1937), pp. 3-4.

(29)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9 (1955)，138 頁；M. von Dewall, "New data on Early Chou finds: Their relative chron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臺北，清華學報，1967，503-568 頁；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8。

於殷商時代的器物有若干具有它們的特色，很可能是當地周人的製品：

當青銅業在安陽地區高度發達的時候，在西北的西安府地區，周國都城所在，當時也有一個平行的發展。雖然當時在二區之間也許有過不少貿易和文物的交換，當初也一定有各區個別所有的地方產物……。

〔地方性的青銅器〕兩個例子可舉斚和盃。在這兩例上，雖然它們在功能上是相似的，端方器組與安陽器組之間在結構上的差異却特別顯著。……安陽殷商時的斚的標本都具鼎足而斚禁組中的斚則具兩足。〔盃足亦同〕。……此外，斚禁組中沒有方彝或角形器，而此組中的禁和所謂尊也在安陽發掘品中找不到類似品(30)。

從上述的分析李濟先生所得的結論，是周文化在武王伐紂以前已經存在，並與殷商王朝有部分的對立，而這種文化中便可能包括着若干有地方色彩的青銅器。寶鷄斚禁器羣雖是西周初年的埋藏，其中個別銅器的製造却顯然的是在殷商時代。李濟先生作此推論的當時，早周文化已經開始在關中文化史中建立，而屬於殷商時代的銅器已也散見在關中各處(31)，而且最近在渭水流域中游的考古遺址中所發現的青銅器，不但有安陽殷墟時代的殷商式的，而且有鄭州時代的殷商式的(32)。這些新的發現，證明了青銅器至少在殷商中期便已在關中出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發現的青銅器中所見的斚多具鼎足，也許還代表殷商對關中周文化影響的早期階段。要專從考古學的證據上看關中的殷商時代周人青銅器的特殊形像我們還得等待更多材料的出現。

這些材料必將隨着關中早周文化考古的進展而大量出現。關中地區西周時代青銅器（尤其是有銘文的）出土的歷史已很悠久(33)，但周代及周代以前的田野考古則事屬輓近。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九月，本所的石璋如先生在關中的涇、渭、雍三水流域作考古調查，共發現了六十處遺址，石氏分之為七期：龍馬、邠縣、豐鎬、潯西、斗門、張家、和鳴玉。當時對陝西史前史和古史的層序還只有初步的了解，這七期文化的絕

(30) Li Chi, "The Tuan Fang altar set reexamined",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3 (1970), pp. 70-71.

(31) 陝西省博物館：青銅器圖釋，1960；「扶風白家窑水庫出土的商周文物」，文物，1977 (12)，84-86 頁。

(32) 「陝西省岐山縣發現商代銅器」，文物，1977 (12)，86-87 頁。

(33) 其在岐都地區的，見陳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 1979/10）一文中的「兩千年來岐邑出土西周青銅器簡目表」。

對年代及其與早周和西周的卡合，還不清楚，但斗門期的「遺物中以灰色繩紋陶為多，其形制與安陽小屯殷商文化層中之遺物相類似」⁽³⁴⁾，可供斗門及其前後期斷代的一個據點。石氏調查的區域，包括雍水流域的扶風、岐山縣境；石氏在這個地區調查以後的觀察如次：

岐本是山的名字，因為雙峯對立故名岐，就是現代的箭括嶺。岐的太王遷徙的地方，在岐山之陽，大家一致的認為是現在的岐陽堡，大概沒有什麼錯誤，因為北面的岐山和南面的周原，確定了它的位置。三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來此調查。從扶風的北關，上到了原頂之後一直到北面的清華鎮，是一個遼廣的平原，再由清華鎮向北到岐陽堡，仍是這個平原向北的延展，北自岐陽堡南至扶風城北，相距約二十五公里左右。在這遼廣的平原上，盡是肥美的農田，所謂周原膴膴真可為名符其實了。……

這裏盜掘的情形，不算很利害，地形的變化，也不如安陽小屯那樣的劇烈，如果他們真的在那裏如此的經營建設，那麼那裏的地下可能埋藏着比較完整的宮室遺址，從那些基址上或者可能把周初的宮室復原起來⁽³⁵⁾。

石璋如先生的這個預料，在三十多年之後已經開始為大規模、有系統的考古工作所證實了。自「1976年2月開始，省文管會和有關市縣文博單位，結合北京大學、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學實習，對周原西周文化遺存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在岐山鳳雛村和扶風召陳村、雲塘村進行⁽³⁶⁾」。目前已經報告的工作只有鳳雛村的一片大型建築基址；其始建年代，「有可能在武王滅商以前」，其使用下限，則「延長到了西周晚期」⁽³⁷⁾。很可能的這批材料就包含着太王、王季、和文王三代周國國都岐邑的一部分遺物，其中的器物在討論殷周關係上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這批材料尚未詳細發表，但在一個貯藏室中所發現的一批卜甲卜骨中有若干有文字的已經問世，見下文的討論。專從基址的形狀上看，其夯土技術及方向定位是和殷商的基址相同的，但這裏

(34) 石璋如：「關中考古調查報告」，本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315頁。

(35) 石璋如：「周都遺蹟與彩陶遺存」，大陸雜誌特刊一，1952，368-370頁。（同文又見「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本所集刊，20，1949，91-122頁）。

(36) 上引「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發掘簡報」，27頁。

(37) 同上，34頁。

的基址較大，它的四合院的布局也與安陽小屯的有若干差異。

除岐邑的大型基址以外，早周遺址近三十年來「在陝西渭水和涇水及其支流的寶雞、鳳翔、岐山、扶風、眉縣、武功、興平、周至、鄠縣、長安、郿縣、長武等地區」都有發現⁽³⁸⁾，其中包括居住遺址、墓葬，和窖藏，在墓葬和窖藏中多有青銅器的發現，已在上文提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遺址中出土的陶器有以下幾個特徵：

(一)夾砂粗灰、紅陶，方唇、高斜領，帶把手，或附加鋸齒狀泥條橫耳以及無耳空心分襠袋足鬲，或圓唇高捲領甗尖足鬲。

(二)有些盆罐的壁中部飾方格紋，有的有雷紋中套乳釘紋；在陶器上飾雷紋的作風可能受了殷商銅器的影響。

(三)泥質灰(紅)陶盆、罐的腹壁較薄，肩腹上部素面磨光。

(四)早周文化層內不見豆、盂，也無腰坑和狗架⁽³⁹⁾。

照研究者的看法，「早周文化遺存在着客省莊第二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的特徵，再根據周文化遺存直接疊壓着客省莊第二期文化遺存的關係，因此我們認為早周文化可能是在客省莊第二期文化的基礎上接受了齊家文化的一些因素發展起來。換言之，早周文化起源於客省莊第二期文化，在它發展的後期受了殷商文化的影響而形成西周時期的社會經濟形態」⁽⁴⁰⁾。

這種說法，似乎很有些道理，但要具體詳細證明恐怕還得等待許多材料與研究結果的發表。目前不妨用作為進一步討論基礎的一個假設，是早周文化與殷商文化都是在中原龍山文化的基礎上發達起來的；在發展過程中互相都有影響。殷商的發達程度可能較早，其較發達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經濟形態都對早周有一定的影響，但周文化自始便有其若干獨特的特徵。周文化是什麼時候達到了青銅器時代與王國形態的政經組織，考古學上還不能判定。我們只知道：(1)殷商中、後期式的青銅器已在關中出現，並且有可能是在當地製造的，而且有些有本地的特色；(2)岐山的周原有大型宮殿基址和甲文發現，其時代可能早到伐紂之前。

(38) 徐錫臺：「早周文化的特點及其淵源的探索」，文物，1979 (10)，50-59頁。

(39) 同上，58頁。

(40) 同上，59頁。